

基督教與文化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Georges Florovsky

弗洛羅夫斯基 著
李樹琴 譯

現代系列

基督教與文化

弗洛羅夫斯基 著

李樹琴 譯

道 風 書 社

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現代系列·229

策劃 楊熙楠

基督教與文化

作者 弗洛羅夫斯基

譯者 李樹琴

執行編輯 殷子俊 王文揚

道風書社 香港新界沙田道風山路33號

網址：<http://www.iscs.org.hk> 電子郵件：publishing@iscs.org.hk

本譯文經正教會中華諸聖會翻譯委員會審核採納

中譯本版權 © 2009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有限公司

2009年初版

版權所有，未經版權持有人之書面允准，不得以任何方式翻印、貯存或傳送本書之任何部分。學術論文或評論之引用除外。

Chinese Academic Library of Christian Thought: Modern Series 229
Publishing Supervisor: Daniel H. N. Yeung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by Georges Florovsky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Li Shuqin

Chinese edition © 2009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Published by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adopted by the Comission of Chinese Orthodox Translations.

Published with the aid of the Orthodox Brotherhood of Apostles
Saint Peter and Paul (Moscow Patriarchate) in Hong Kong
and Orthodox Fellowship of All Saints of China



Frist published 2009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is a division of the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It fosters Sino-Christian scholarship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worldwide through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Address: 33 To Fung Shan Road, Shatin, N.T., Hong Kong
Tel: (852) 2694 6868 Website: <http://www.iscs.org.hk> Email: publishing@iscs.org.hk

PRINTED IN HONG KONG ISBN 978-962-8911-51-6



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

策劃 楊熙楠

文庫學術委員

(以中文姓氏筆劃順序)

王曉朝

北京 清華大學哲學系

李秋零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

陳佐人

美國 西雅圖大學神學及宗教學系

賴品超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文庫學術顧問

ACADEMIC ADVISORS TO THE CHINESE ACADEMIC LIBRARY OF CHRISTIAN THOUGHT

柯林斯 (Adela Yarbro Collins)
美國 耶魯大學神學院教授

福特 (Bruno Forte)
意大利 那不勒斯大學神學系教授

約恩森 (Theodor Jørgensen)
丹麥 哥本哈根大學神學系榮休教授

考夫曼 (Gordon D. Kaufman)
美國 哈佛大學神學研究院榮休教授

烏爾蘇拉·金 (Ursula King)
英國 布里斯托爾神學及宗教研究學系榮休教授

漢斯·昆 (Hans Küng)
德國 圖賓根大學普世宗教研究所榮休教授

麥格夫 (Alister McGrath)
英國 倫敦大學英皇學院教育及專業研究系教授

莫爾特曼 (Jürgen Moltmann)
德國 圖賓根大學神學系榮休教授

奧特 (Heinrich Ott)
瑞典 巴塞爾大學神學系榮休教授

潘能伯格 (Wolfhart Pannenberg)
德國 慕尼黑大學神學系榮休教授

羅明嘉 (Miikka Ruokanen)
芬蘭 赫爾辛基大學神學系教授

施賴特爾 (Robert J. Schreiter)
美國 天主教神學研究院神學系教授

舒士拿—費奧倫查
(Francis Schüssler Fiorenza)
美國 哈佛大學神學研究院教授

泰森 (Gerd Theissen)
德國 海德堡大學神學院教授

田道樂 (Notto R. Thelle)
挪威 奧斯陸大學神學系教授

特雷西 (David Tracy)
美國 芝加哥大學神學研究院榮休教授

韋爾克 (Michael Welker)
德國 海德堡大學神學系教授

總序

歷史地觀之，基督宗教有社會和思想兩個層面。前者指基督教會的形成及在諸民族社會中的傳入和生長過程；後者為基督信仰在神學、哲學、文學、藝術中的思想性歷史表達。基督宗教的社會層面和思想層面儘管相關聯，仍各具不同的形態。

基督教思想成形於公元最初三百年，其時有希臘語思想者和拉丁語思想者（希臘教父和拉丁教父）假希臘化哲學思想和羅馬哲學思想，表達對基督事件之認信，開基督思想之先河。在中世紀，基督思想在拉丁語文化中與古希臘思想再度融糅，形成歐洲中古思想之主流。近代以來，基督新教隨宗教改革而衍生，民族國家形成，基督思想遂與歐洲諸民族語言文化融糅，形成風貌各異之基督思想。俄羅斯則直承早期希臘語基督思想，形成獨特的俄語基督思想（東正教思想）。近百年來，隨肇始於歐洲之社會現代化過程，基督思想亦植入亞洲，產生漢語、韓語、日語之基督思想。

語文乃思想文化之容器，基督思想之品質超逾民族性，形態卻僂依於民族語言織體。故基督思想既具普世性，又具民族語文思想個性。基督思想歷近兩千年語程，迄今仍在諸民族文化言路中伸展，成為世界性文化之重要結構要素。

翻譯乃民族文化拓展之良屐，「周、秦之語言，至翻譯佛典之時代而苦其不足；近時之語言至翻譯西典時，而又苦其不足。」（王國維語）中國學界百年翻譯之業為漢語思想走出自我封閉，拓展自身開闢了途徑。四十年代，美國神學家、漢學家章文新博士創設「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翻譯計劃，與中國神學家謝扶雅教授等共同從事，至六十年代已成三十二部。《集成》開創了基督教思想典籍的漢譯事業，令學術界感佩。同時，《集成》也有歷史局限：選題系統性強而譯述零碎（不少典籍為節譯）；漢譯表達不盡人意；對十九世紀以來的基督教思想學典顧及不足。最令人遺憾的是，《集成》未完成預定規劃而終。

本文庫願繼前輩學者漢譯基督教思想學典未盡之業，以補漢譯泰西學術中遂譯基督教思想學典之不足。文庫定名為「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表明僅涉及基督宗教的思想史文獻，旨在積累歷代基督教思想的漢語學術典藏。

本文庫以翻譯為主，分三個系列：

- I. 古代系列（希臘化時代至中古末期基督思想文獻）：含希臘語早期基督思想和中古拉丁語基督思想的典籍。
- II. 現代系列（從十六世紀至當代基督宗教的神學思想文獻）：含近現代西方各民族語文之天主教、新教、東正教的基督思想典籍。
以上兩系列亦包括猶太教思想和漢語基督教思想文獻。
- III. 研究系列（近現代研究基督思想的人文—社會科學文獻）：含近現代中西學者以人文—社會科學語境中對基督思想的研究典籍。

雖然基督宗教思想之傳統是在不同的信仰群體內建構生成的，但神學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在現代學術語境中亦躋身於公共大學和文化建制，形成兩種個性不同（但不一定相悖）的論述取向。為此，現代系列和研究系列之主要分野為著述之取向，若偏近大公教會神學傳統者屬現代系列，若偏近人文—社會科學維度者則屬研究系列。

現代學術（人文—社會科學）的首要任務是，以知識學的原則和方法檢審歷史和現實中的思想和社會，盡可能與意識形態保持距離地研究人類的意識理念和生活樣態。在這種學術形態中，基督教神學作為一門傳統思想也發生了變化，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基督教思想及學術不僅是歐美思想文化的傳統並迄今仍為其基本結構要素，亦已成為漢語思想及學術的一個組成部分。從現代學術的角度，研究基督教의思想和社會之歷史和現實，是漢語學術界的一項任務。

文庫之編譯工作由中國人文學者從事，編譯者願承中古漢語學者為豐富漢語思想文化傳譯佛典之心智和毅力，「安知不如微蟲之為珊瑚與羸蛤之積為巨石也」（章太炎語）。

漢語學術思想值現代轉型重鑄之際，文庫願益於漢語思想之豐碩，不負漢語學術之來者。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中譯本導言

張百春

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

一、生平與著述

格奧爾吉·瓦西里耶維奇·弗洛羅夫斯基 (Georges Vasilievich Florovsky, 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Флоровский) 於一八九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在俄國伊麗莎白格勒 (Elisavetgrad)* 的一位司祭家庭。一八九四年，全家遷往敖德薩 (Odessa)。一八九五年，他父親成為敖德薩主教教堂的主持。一九一一年，弗洛羅夫斯基畢業於敖德薩第五中學，獲得金制獎章，有權在俄羅斯選擇任何一所大學學習。因身體原因，他選擇附近的新俄羅斯大學 (現敖德薩國立大學 [Odessa National University])，進入歷史語文系。在大學期間，他獲得了歷史方面的良好教育，深入研究過文學和哲學，同時還研究過數學、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等自然科學。一九一二年，弗洛羅夫斯基發表第一篇概論性的文章〈關於索洛維約夫研究的新書〉 (Новые книги о Владимире Соловьеве)。一九一三年，他的論文〈古代和近代戲劇中的安菲特律翁神話研究〉 (Разработка мифа о Амфитрионе в древней и новой истории) 獲得古典語言學方面的銀獎。一九一六年，他的哲學論文〈現代推理學說〉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учения о умозаклучениях) 獲

* 現為烏克蘭的基洛沃格勒 (Kirovohrad)。——編注

得金獎，在這一年，他通過考試，留在大學的哲學和心理學部，準備從事教育事業。直到一九一九年之前，他一直在準備碩士考試，同時在敖德薩中學講授邏輯學和哲學課程。一九一九年十月，他在敖德薩大學經過試講後，獲得編外副教授職位。

十月革命以後，俄國的局勢動蕩。白俄羅斯與布爾什維克發生內戰，弗洛羅夫斯基和家人認為白俄羅斯軍隊勝利無望，於是全家在一九一九年底離開俄國。一九二〇年一月，他們到達保加利亞的索非亞（Sofia）。起初，弗洛羅夫斯基擔任私家教師，給孩子們上課，並在一家出版社從事技術工作，同時準備有關赫爾岑（A. I. Herzen, А. И. Герцен）的學位論文。在保加利亞期間，弗洛羅夫斯基開始接近薩維茨基（P. N. Savitsky, П. Н. Савицкий）、特魯別茨科伊（N. S. Trubetskoу, Н. С. Трубецкий）和蘇夫欽斯基（P. P. Suvchinsky, П. П. Сувчинский）等人，與他們一起創立歐亞派（Eurasianists），並在該派出版物上發表一系列文章，為以後的寫作活動奠定了基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弗洛羅夫斯基離開索非亞移居到布拉格（Prague），從一九二二年秋天開始在高級商學院講授俄羅斯文學史課程，冬天在布拉格大學（University of Prague）下屬俄羅斯法律系給諾夫格羅采夫（П. Новгородцев）和阿列克謝耶夫（Н. Алексеев）教授以及古列維奇（Г. Гурвич）副教授擔任「法哲學與國家法」討論課的助教。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布拉格，弗洛羅夫斯基與西蒙諾娃（X. I. Simonov, Ксения Ивановна Симонова）結婚，後者是個很有天賦的藝術家和翻譯。一九二三年六月三日，他通過碩士論文答辯，論文題目是〈赫爾岑的歷史哲學〉（Историософия Герцена）。這篇論文引起激烈爭論，正

式評論員是尼·洛斯基 (Н. Лосский)、斯特盧維 (П. Спаруве) 和津科夫斯基 (В. Зеньковский)。獲得碩士學位後，弗洛羅夫斯基在法律系法哲學史教研室任編外副教授，講授「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課，並指導實踐課。一九二三年秋，弗洛羅夫斯基開始離開歐亞派，因為他感覺到歐亞派裏有強烈的政治傾向，與該運動最初的原則不符。他把「東正教和文化」放在首要地位，因此無法容忍歐亞派的政治化傾向，也不贊同歐亞派領袖們的「民族—布爾什維克」傾向。與歐亞派劃清界限，導致他與薩維茨基的私人衝突，並與布爾加科夫 (S. N. Bulgakov, С. Н. Булгаков) 接近，後者成了他的精神之父。此間，布爾加科夫邀請弗洛羅夫斯基參加宗教團體聖索菲亞會，該會聯合了大多數老一代俄羅斯宗教思想家。加入這個組織後，弗洛羅夫斯基與歐亞派徹底決裂。

一九二六年，弗洛羅夫斯基應邀去法國巴黎的聖謝爾蓋東正教神學院 (St. Sergius Orthodox Theological Institute)，任教父學教授，一九三二年接受神職，成為神父，祝聖儀式由都主教葉夫羅基 (Евлогий) 主持。此時，他已經發表了許多出色的佈道著作，如《末日審判》(Страшный суд)、《關於基督的復活》(Слово о воскресении Христовом)、《來自基督誕生》(От Рождества Христова) 等。宗教和神學問題成了他研究的重點，尤其是教父學研究，先後有兩部專著出版，即《四世紀的東方教父》(Восточные Отцы IV века, 1931) 和《五至八世紀的拜占庭教父》(Византийские Отцы V-VIII веков, 1933)，都是在神學院講義的基礎上寫成的。一九三七年，弗洛羅夫斯基最著名的著作《俄羅斯神學之路》(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出版，其內容

廣泛涉及俄羅斯東正教神學、宗教哲學和俄羅斯思想史。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戰爭期間，他先是在南斯拉夫，之後去了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五年底返回巴黎，在聖謝爾蓋東正教神學院任道德與教義神學教授，從一九四八年起，任教義學教授。

在歐洲時期，弗洛羅夫斯基積極參加俄羅斯僑民所組織的各種活動，與俄羅斯宗教哲學著名代表之間建立友好聯繫。但這種聯繫維持的時間不長，最後他與別爾嘉耶夫（N. A. Berdyaev, Н. А. Бердяев）、布爾加科夫等人的關係到了無法調節的地步（這是他後來離開巴黎去美國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其中有學術上的紛爭，但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另外不能不注意到他們之間在年齡上和經歷上的巨大差別，弗洛羅夫斯基自己也強調過這一點，在第一代流亡的俄羅斯哲學家和神學家中間，他的年齡最小，他與別爾嘉耶夫相差十九歲，與布爾加科夫相差二十二歲。當俄羅斯在二十世紀初興起宗教復興運動時，弗洛羅夫斯基還是個少年。其他人經歷的所謂宗教信仰上的危機，他沒有體驗過，更沒有重新向宗教信仰復歸的經歷。那些喪失過信仰的人，在復歸信仰之前都有過反教會的經歷，這個經歷無論如何對他們以後的發展道路至少在心理上產生了巨大影響，而弗洛羅夫斯基則從來沒有對作為「真理的柱石與確證」的教會有過甚麼失望。作為世紀初宗教復興的著名代表，別爾嘉耶夫和布爾加科夫等人認為自己的任務是繼續這個復興，而弗洛羅夫斯基所選擇的完全是另外一條路——「回到教父那裏去」，他專注的是東方教父，而不是俄羅斯的宗教復興。

一九四八年九月，弗洛羅夫斯基移居美國，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五年任聖弗拉基米爾東正教神學院（Saint

Vladimir's Orthodox Theological Seminary) 主任，同時在各大學和神學院教書，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六年任聖弗拉基米爾神學院院報的主編，該報就是在他的倡議下出版的，這是第一份用英文出版的東正教雜誌。弗洛羅夫斯基對神學院的一系列改革引起了教會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一九五四年，由於外界的壓力和不滿，他被迫辭去神學院主任之職，當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對他的不滿達到了頂峰時，他不得不離開聖弗拉基米爾，到哈佛神學院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任教，從一九六四年起，在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神學和斯拉夫學部講課。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弗洛羅夫斯基在美國的普林斯頓去世。他曾是許多美國和歐洲大學的榮譽博士，國家的或國際科學院院士，他還是美國歷史學會理事、美國教會史學會理事、美國斯拉夫學發展委員會理事等等。此外，他還擔任過美國教會國家理事會副主席 (1954-1957) 等職務。¹

弗洛羅夫斯基的前期著作主要是用俄文寫成，到了一九三四年，他用俄文和英文所發表的文章在數量上已經各佔一半，此後，他主要用英文發表作品。其主要著作有《四世紀的東方教父》、《五至八世紀的拜占庭教父》、《俄羅斯神學之路》等。在《俄羅斯神學之路》後，弗洛羅夫斯基沒有再出版過大篇幅的著作，但他一生寫下了大量的文章，這些文章都是就某些神學問題而寫的，我們在這裏僅列出一九三五年以前的比較有影響的俄文論文：〈人的智慧與上帝的聖智慧〉 (Человеческая

1. 關於弗洛羅夫斯基的生平參見：Эндрю Блейн，〈格奧爾吉神父生平〉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отца Георгия)，載氏著，〈弗洛羅夫斯基：神職人員、神學家、哲學家〉 (Георгий Флоровский: священник, богослов, философ;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Культура, 1995)，頁 7-240。

мудрость и Премудрость Божия, 1921)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歐洲〉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Европа, 1922) 、〈宗教體驗與哲學意識〉 (Религиозный опыт и философское сознание, 1923) 、〈論古代俄羅斯基督教的特徵〉 (О характере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1924) 、〈普世傳統和斯拉夫理念〉 (Вселенское предание и славянская идея, 1925) 、〈歐亞主義的誘惑〉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 1928) 、〈被造物和被造性〉 (Тварь и тварность, 1928) 、〈奧利金主義的矛盾〉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оригенизма, 1929) 、〈聖餐禮和聚和性〉 (Евхаристия и соборность, 1929) 、〈基督曾經生活過嗎?〉 (Жил ли Христос?, 1929) 、〈論十字架之死〉 (О смерти крестной, 1930)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主題〉 (Религиозные темы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1931) 、〈論拜占庭和俄羅斯對上帝的聖智慧索菲亞崇拜〉 (О почитании Софии, Премудрости Божией, в Византии и на Руси, 1932) 、〈教會中的基督徒〉 (Христианин в Церкви, 1933) 、〈基督教重新聯合的問題〉 (Проблематика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я, 1933) 、〈論教會的界限〉 (О границах Церкви, 1933) 和〈論死人的復活〉 (О воскресении мертвых, 1935) 等。一九九八和二〇〇〇年在莫斯科出版了兩本弗洛羅夫斯基的著作集《教義與歷史》(Догмат и история) 和《神學論文選》(Избранные богословские статьи) 。弗洛羅夫斯基用英文寫作的大部分文章目前還沒有俄文版。

二、俄羅斯東正教神學及其存在的問題

俄羅斯人在九八八年接受了基督教，準確地說是從拜占庭帝國接受了東方基督教，即希臘東正教。接受東

正教的俄羅斯人在信仰上直接融入基督教世界。不過，在文化領域，在思想創造領域，俄羅斯人並沒有立即跟上基督教世界的腳步。在俄羅斯接受基督教之前，希臘語世界和拉丁語世界的基督教神學創造不但成為整個基督教神學的基礎，而且更重要的是鞏固了基督教在異己文化世界裏的地位，在使一個非基督教世界基督教化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以希臘教父為主的神學創造構成了早期基督教神學的主要成果，拉丁語世界也出現了諸如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等偉大的神學家。在俄羅斯接受基督教後不久，基督教正式分裂了（1054年）。此後的基督教神學創造並沒有停止。天主教經院哲學在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那裏達到了頂峰。在希臘東正教方面，帕拉馬斯（Gregorius Palamas）的靜修主義（Hesychasm, исихазм）是晚期拜占庭東正教神學的頂峰。十六世紀初，新教從天主教裏分離出來。新教各派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了強烈的創造慾望，其神學思想非常活躍，流派紛呈，成果豐富。相比之下，在神學創造領域，俄羅斯人在沉默，這種沉默持續時間之長令人驚訝，前後長達八百年。因此，弗洛羅夫斯基提出一個問題：「在俄羅斯思想史中有許多神秘的和不可理解的東西。首先，這個長期的、過長的和持續的俄羅斯式的沉默意味着甚麼？如何解釋俄羅斯思想的這個姍姍來遲的覺醒？」²這些問題表面上針對俄羅斯文化，實際上指的是東正教。這裏包含着一種對東正教的願望和期盼，並夾雜着對它的指責——它不應該總是沉默。俄羅斯東正教神學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證明自己的存在。

2. Флоровский, 《俄羅斯神學之路》（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Париж, 1937），頁1。

俄羅斯人接受東正教之後，儘管在信仰實踐、教堂建築、聖像繪畫等方面都有很大進步，但在神學創造方面確實在沉默。不過，他們對基督教神學並不陌生。首先，隨着東正教的傳入，俄羅斯人知道了東正教神學的基本內容。教父著作和教父思想、希臘哲學在俄羅斯都有一定的傳播。但俄羅斯人並沒有表現出對神學和哲學的興趣，沒有系統地掌握豐富的東正教神學思想資源，拜占庭東正教神學對俄羅斯人的神學創造沒有發揮甚麼作用。其次，天主教神學以各種方式向俄羅斯滲透。天主教進入俄羅斯的時間不比東正教晚，俄羅斯人最終選擇了東正教，但天主教在俄羅斯，特別是在其西部（烏克蘭地區）的傳播從未間斷。³天主教神學及神學教育體系在中世紀已經形成，當這個體系傳入俄羅斯之後，被神學界接受了。除了天主教神學體系外，俄羅斯神學界還接受了這個體系所使用的語言——拉丁語。弗洛羅夫斯基因此斷定，在俄羅斯神學領域，佔主導地位的是天主教神學，這就是所謂的「西方影響」，即對俄羅斯神學產生影響的不是東方的拜占庭神學，而是拉丁語世界的西方天主教神學。「神學科學是從西方移植到俄羅斯來的，很長時間以來，它在俄羅斯一直是個外鄉人，它甚至頑固地堅持使用自己獨特的、與俄羅斯格格不入的語言（不是日常生活用語，也不是禱告的語言）。這個神學科學彷彿是某種加入到教會有機體中的非東正教的東西。在俄羅斯，神學科學是在人為的和十分異己的環境中發展的，它成了學院科學，而且一直是這樣。神學科學變成了一門課程，已不再是對真理的揭示或者是對

3. 參見樂峰主編，《俄國宗教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下卷，頁 681-703。

信仰的宣傳。神學思想不再呼應教會心臟的波動，因此，它失去了接近教會心臟的途徑。在更廣泛的教會階層和信眾中間，它沒有引起注意和同情。在最好的情況下，神學科學是個沒有用處的東西。」⁴作為外來的東西，神學在俄羅斯的命運是不幸的。

俄羅斯的宗教土壤無疑是東正教的，這就注定了天主教神學在俄羅斯大部分信徒中間無法扎根。因此，神學成了少數人的特權，他們被孤立了，一方面得不到東正教會的重視，另一方面遭到廣大信徒的抵制。神學學術與教會生活和大眾信仰之間發生了斷裂。神學在俄羅斯沒有了根基，喪失了創造的源泉和動力。此外，神學在俄羅斯所使用的語言既不是希臘語（拜占庭東正教的語言），也不是斯拉夫語（俄羅斯東正教的語言），而是拉丁語。眾所週知，最終導致天主教和東正教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東西方都用自己的語言向上帝祈禱。在東正教徒的心目中，拉丁語就代表了西方天主教。廣大東正教信徒對拉丁語沒有任何好感，強烈抵制一切神學。「神學無用論」在俄羅斯東正教界非常盛行，舊禮儀派（Old Believers [старообрядцы]，十七世紀中葉俄羅斯東正教會分裂的結果）就是這種神學蒙昧主義的典型代表，該派信徒把整個東正教信仰歸結為一套永遠不能改變的僵化的禮拜儀式，就像保衛自己的信仰那樣，不惜用生命去保衛自己認為正確的儀式。蒙昧主義在俄羅斯東正教歷史上的另一表現是對《聖經》的輕視。一個理想的東正教徒不必與《聖經》聯繫起來。信徒自己閱讀《聖經》，或就其中的內容進行爭論，這被看作是高傲和狂妄，在信仰上是不可靠的。有人甚至擔心，信徒

4. Флоровский, 《俄羅斯神學之路》，頁 503。